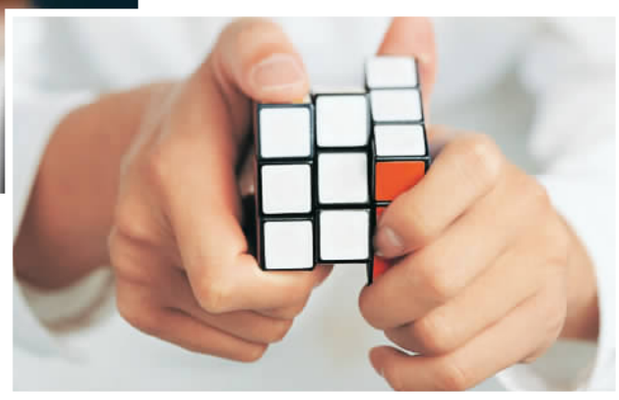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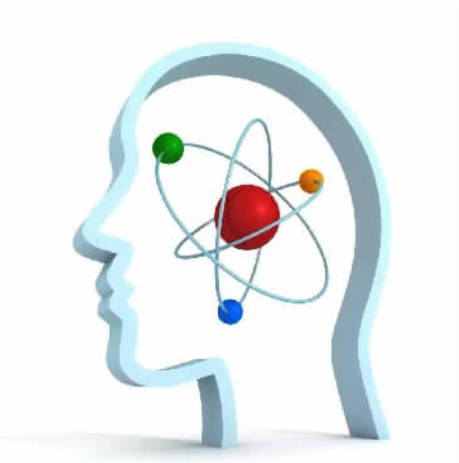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和典故，无不闪耀着传统辩证思维的光辉。

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思维结构，辩证思维不仅体现在我国历代思想家的理念世界里，而且渗透到农业、医药、军事、民俗、宗教、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难怪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讲辩证 整体关联 动态平衡

李勇刚



“阴阳”范畴的演变轨迹背后，渗透着中华民族独特“意象思维”

北宋理学家程颢曾多次在半夜思索宇宙人生的奥秘，有一番体悟令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究竟是什么发现让程颢如此兴奋？原来是“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所谓“无独必有对”，即是说万事万物不能孤立存在，都是相对而生的。对于这个道理，古人有专门的范畴来表述，那就是“阴阳”。

“阴阳”最初的含义，大概与日光的向背有关。《诗经》云：“既景既冈，相其阴阳。”此处所谓“阳”，就是朝向日光的地方，而“阴”则是背对日光的地方。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把“阴阳”的范畴推而广之。比如，在天地、日月、男女、雌雄、昼夜、寒热等相对存在的现象中，把天、日、男、雄、昼、热等具有光明、温暖、刚健、生发、向上、活动等属性的现象归为“阳”，而把地、月、女、雌、夜、寒等具有黑暗、寒冷、柔弱、收敛、向下、静止等属性的现象归结为“阴”。最终，阴阳成为表征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这一特性的哲学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黄帝内经》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阴阳”范畴的演变轨迹背后，渗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意象思维”，就是立足具体的形象，通过类比和隐喻等方式，来表现抽象的意义。它不同于抽象思维或形象思维，而又兼具二者的特点。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强调阴阳之间的激荡与感应，强调整体的和谐

从作为儒家圣地的孔庙大成殿，到道教七十二福地之首的楼观台；从中医、武术的徽标，到韩国的国旗；从新加坡空军的机徽，到诺奖获得者玻尔爵士的族徽——都跃动着阴阳鱼太极图的形象。作为“中华第一图”的太极图，是传统辩证思维的生动体现。

阴阳鱼太极图由黑白不同、彼此相抱的两条鱼组成，缺少一条，都不成其为太极，此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因此《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同时，令人称奇的是，阴鱼中有一只阳眼，阳鱼中有一只阴眼。这说明，阴阳双方并非绝对对立，而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与韩非子所说的“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紧张对立，完全大异其趣。而太极图中间的曲线，则将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相成的关系生动地刻画出来——如果是直线，那么更多传达的是对立、冲突的讯息。并且，这条曲线不仅是阴阳鱼的分界线，更是让它们关联一个整体的连接线。正如海岸线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开海洋和陆地，更在于将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强调阴阳之间的激荡与感应，强调整体的和谐。《周易》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并将表示天地相交的卦命名为“泰”，而将表示天地不交的卦命名为“否”。另外，《周易》的下经从“咸”卦开始，而“咸”卦的要义，在于以少男、少女交感的意象，阐发感应的道理：“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不同层次的感应所造就的，是一个“万物化生”“天下和平”的世界。

中国古人还发展出与“阴阳”学说密切相关的“五行”学说，来描述事物的类别和属性。五行之间的生克，也是传统辩证思维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辩证思维能为世人提供切中时弊的思想资源和行为指南

在《周易》看来，整个宇宙处在一个变动不居、大化流行的过程中——“易”字本身就有“变易”的含义。传统辩证思维强调，要从“变易”中找到“不易”，把握“变而有常”的那个“常”，从而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为此，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是见微知著，注重细节。《周易》说：“履霜，坚冰至。”当双脚踏上秋霜，就要知道寒冷的冬天快到来了。这就是从细小的现象出发，感知变化的大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人强调要注重细节——既要通过日积月累，促成积极的变化，所谓“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也要学会防微杜渐，阻止消极的变化，正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其二是保持限度，无过不及。如果要保持事物的性质，就应当将变化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尤其是在修身、行事的领域，更应该奉行中庸之道，把握适度原则。孔子认为“过犹不及”，就是说做过了和没做够，效果都是一样的。因此，《论语》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君子要“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做到“文质彬彬”，其实都是在探寻那个最合适的“度”。否则，就容易“亢龙有悔”。

其三是把握时机，注重变通。既然万事万物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那么“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周易》强调“与时偕行”，而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如何在具体的境遇中，找到最恰当的应对方式？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值得善加玩索。

其四是发挥主动，促成变化。《易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事物的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是“物极必反”。对此，《老子》提出，人可以主动促成这种变化：“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的范畴和框架，与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多有内在呼应。尽管阴阳、五行在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存在过度比附、神秘化的弊端，但不能因此否认古人从自身角度去解释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积极努力。在当前世界主客二元对立加剧、各种冲突危机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强调整体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交融与和谐的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想必能为世人提供切中时弊的思想资源和行为指南，让人们用一种更加灵动、活泼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世界，在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相与中更加和谐而圆融。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 中国最美古村

山下阳：八卦迷宫『星相村』

王锦强

浙江松阳古村落主要可以分为平原村落和山地村落两个类型。平原村落多逐水而居，或临近松阴溪及其他溪流，或人工开渠引水入村。建筑风格为土墙黑瓦，坐北朝南，是北民南迁带来“四合院式”，并吸收原来土著越族“杆栏式”而成。山地村落一般选址于向阳的坡面或谷地，风格更偏向浙南原来土著的杆栏式、悬空式建筑。

山下阳村则是一个另类。山下阳村隶属松阳县古市镇，明代之前建村，据《松阳地名志》介绍，村庄因地处大岭北山南麓，故名山下阳。全村现有465户，1206人。村内古渠、古堰、古树、商业街、楼阁、宗祠、社庙、香火堂、月池、荷花塘、古井等历史风貌基本完整，民居建筑风情独具。

山下阳村虽小，但该村以传统的风水理念谋篇布局，以与自然山水唇齿相依开宗立意，并且达到了形神兼备、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村落格局如八卦迷宫，街道曲折迷离，处处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堪称古代按风水学基本原理建村的典范。

初次踏入山下阳村，估计大多数人会迷路。因为，从山下阳村的第一条路开始，就为不速之客们摆下了迷魂阵。这里很少有十字路口，有的是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丁”字路口，寓意子孙后代人丁兴旺。客家人发音“丁”“灯”不分，家中添丁，大门必挂灯彩告示天下。在山下阳村，村落按照星相学说，本着符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原则选址布局。村庄依靠自北向南的六都源水而建，以月池、地坛、张氏香火堂、张氏私塾为中轴线。宗祠在前，风水塘居中，香火堂殿后，前后夹承风水，祈求天地、祖先护佑其文运昌盛、家风顺达。整体又呈出长方形阵矩，颇具水乡风韵。村中丁字形巷道纵横交错，逼仄深幽，卵石大小整一。村中月池呈半圆形横卧于香火堂前方，与池后方形祭坛构成“天圆地方”的人造景观。村落建立之初有一道环村围墙，建有大量的村门、巷门，如同一座壁垒森严的堡垒。环绕村落流淌的溪流、密布的池塘，门前流圳渠流水汩汩，使得整座村落里老屋新居鳞次栉比，交相辉映，而且防火体系格外严密，取水也非常便利。

山下阳村的历史建筑，闽南、浙南、徽派、西式风格南来北往，东西合璧，难能可贵的是当地工匠们做到了兼容并包，而且出其不意，如鬼谷子兵法，兵不厌诈，深邃迷幻，进来不易，想出去更难。山下阳村现存古建筑群包括张氏宗祠、张氏祖堂，21幢民居，2幢店铺以及夫人庙旧址，社庙旧址，一幢紧挨一幢，或山墙毗连，或邻弄相隔，马头墙高低起伏，连绵成片，勾勒出村庄嵯峨的历史轮廓。居民穿房过巷不需外部空间，也能避免雨淋日晒，建筑群相互独立又浑然一体。

作为一种宗族聚居的村落特色样本，山下阳村的出现及其发展变化透射出深刻的民族民间文化内涵。山下阳村既生动地体现了农耕文化传统，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本原理，同时，又将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大胆结合，很早就在建筑学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但根本上反映的还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理念。

□ 汉字故事

“琅琊”几欲迷人眼

杨立新

琅琊山风景区大门上的“琅耶山”

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让“琅琊”一词迅速走入大众视线。“琅琊”地名最早出自山东，据记载，春秋时期齐国置有琅琊邑；秦朝三十六郡之一的琅琊郡，郡境即在山东东南部。西晋灭亡后，衣冠南渡，于是南京、滁州两地也出现了南琅琊郡、琅琊山等地名。

“琅琊”，古代文献中多写作“琅邪”，有时也作“琅玡”或“瑯琊”。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既无“琊”，也无“玡”，只有个“邪”字。解释为：“邪，琅邪郡也。从邑、牙声。”清代学者段玉裁注曰“以遮切”。故“琅琊”的初文应为“琅邪”，根据“邪”的反切音，读作yé。

《说文》中小篆“邪”

“邪”收在《说文·邑部》中，由其小篆字形可知，“邪”的“阝”旁为“邑”，而“邑”的本义是人群聚居的地方，用于国名、地邑名、封地名。因此，“邪”的本义为地名专用字。后来“邪”被假借用来表示邪正的“邪”，而其本字“衰”反而很少使用了。

那么，“琅邪”为何又写成“琅琊”？段玉裁注为：“按汉碑‘琅邪’字或加玉旁，俗字也。”故“琊”为“邪”的俗体字。

至于“琅玡”的由来，本人尚未查到相关资料。我想，大概是“琅琊”的简便写法。因“琊”字的“阝”旁表地名，“琅琊”又为专有名词，故去其偏旁不会造成歧义。如古人因“衞衛”书写繁难，就简写成了“胡同”。而“瑯琊”则应为“琅琊”的繁化，“琅”加“阝”旁表地名，其用法如同“邯郸”。

另外，唐《九经字样》还持“郎邪”一说：“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属邹鲁，人有善道，故为郡名。今经典玉旁作良者讹。”对此，段玉裁予以断然否定：“未知其说所出。古书绝无作‘郎’者，且琅邪齐地，非邹鲁地。”

上述“琅琊”的诸种写法着实让人眼花缭乱。2011年，安徽省高考语文试卷有两道题分析欧阳修的《琅玡溪》诗，注释为：“琅玡溪在滁州琅玡山。”很多人认为“琅玡山”是错字，甚至误传为“狼牙山”，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安徽省教育厅为此在微博上发表声明予以澄清。此前，在安徽滁州琅琊山风景区大门上，还出现了“琅耶山”写法，落款为大名鼎鼎的苏轼。当地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苏东坡醉时所题，错把“琊”字写成了“耶”。

对此，2006年3月15日安徽《江淮晨报》根据读者热线反映刊登《琅琊山变成“琅耶山”?》一文，有关专家认为：“耶”字在古代是“琊”的通假字。

其实，上述说法并不准确，“耶”并非“琊”的通假字，而是由“邪”的隶书讹变而来。唐《干禄字书》注明“耶通、邪正”。段玉裁交代了“耶”字的由来：“近人隶书从耳做耶，由‘牙’‘耳’相似。”

隶书“邪” 隶书“耶”

“琅耶”多出现在两晋墓志铭文中，如《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等。在景区宝宋斋内，有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琅耶山”三字显然集自此碑。

宝宋斋《醉翁亭记》碑拓片

《醉翁亭记》碑是苏东坡楷书四大名碑之一，故历代极为宝重。但是，历史上对宝宋斋内的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却颇多质疑，认为很可能是明初重刻。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崇宁二年（1103年），有旨：应天下碑碣牓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醉翁亭记》碑当在除毁之列。

然而，《醉翁亭记》碑并无重刻碑文的题记和跋尾，故又有人认为否认此碑为宋代原物似嫌证据不足。明崇祯年间宝宋斋的建造者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在《宝宋斋记》中就称：“醉翁碑犹为故物，历五百余季”。指明《醉翁亭记》碑乃宋代原物。

不过几百年来有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却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醉翁亭记》碑尚有宋拓本传世，可为这一千古聚讼定案。两相比对就会发现，宝宋斋《醉翁亭记》碑绝非宋碑，纰漏恰恰出在“琅耶”二字上！

下为《醉翁亭记》碑的北宋初拓本，可知苏轼原碑应为“琅玡”，而非“琅耶”。至于宝宋斋《醉翁亭记》碑为何将原碑翻刻成“琅耶”，是有所避讳，还是别有隐情，尚不得其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

《醉翁亭记》碑北宋初拓本